

## 民族主義的兩面刃—— 第二次世界大戰泰國外交政策的演變

鄧育承

雲林科技大學教學卓越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 摘要

19 世紀中，英法列強環繞，泰國在制定外交政策時需考量自身所處的地緣政治與國家利益，於強權權力結構下提升其於東南亞的相對權力。國際關係現實主義與地緣政治學者普遍認為，泰國與歐洲列強交涉或結盟都是自身利益極大化的安全考量，本論文透過檢視歷史文獻歸納出民族主義的兩種論述：「王室——民族主義」與「喪失國土」。然而，泰國第三任內閣總理披汶·頌堪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透過媒體大肆渲染「喪失國土」論，透過與日本的影響力，收回部分失土。本論文的主旨是運用建構主義來詮釋第二次世界大戰泰國外交政策的演變，認為國家互為主體的行為者在認知其在國際政治結構中的國家利益，有助於形塑國際政治結構中的國際地位。國際體系的產生乃是基於國家行為體對社會的認同後，「泛泰主義」就是泰國軍事菁英所操縱的文化秩序，建構主義在二次世界大戰泰國外交政策中提供另一個詮釋泰國外交政策的途徑。

**關鍵詞：**民族主義、王室——民族主義、喪失國土、建構主義、披汶

## 壹、前言

泰國為一佛教國家，暹羅 (Siam) 為其舊國名，位於中南半島，西鄰緬甸，東鄰柬埔寨與寮國，南接馬來西亞。泰國是唯一沒有被西方殖民過的國家，同時也是王室傳統保持最完整的國家。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下列四個王朝：(1)素可泰王朝 (Sukhothai Kingdom, 1238-1438)；(2)阿瑜陀耶王朝 (Ayuttaya Kingdom, 1351-1767)；(3)吞吐里王朝 (Kingdom of Thonburi, 1768-1782)；(4)卻克里王朝 (Chakkri Kingdom, 1782-1932)。歷經上述王朝的更迭，泰國的王室制度仍在泰國社會保有一定的影響力。

1850 年代，英法兩國分別開始在中南半島開始進行殖民事業上的競逐，1855 年中法戰爭後法國占領越南，1886 年英國完全控制緬甸。處於兩強之間的暹羅，面對經濟主權的干預與國土的入侵，最終導致 1893 年的法暹戰爭。泰國除了割讓寮國，隨後衍伸出治外法權的爭議更挑戰泰國的司法體系 (van Dijk, 2015)。歷史對法暹戰爭的評價有兩極，持正面看法者認為王室為了維持泰國的獨立，割地使泰國免受殖民迫害；持負面看法者認為喪失國土已在泰國人民心中烙下印記 (Strate, 2019)。

軍事政變乃是泰國政治的「特色」，自 1932 年 6 月泰國發生政變後，泰國由君主專政改為君主立憲政體，開啓了泰國政變的模式。根據泰國憲法的精神，泰王身為國家元首，「統而不治」象徵國家統一與內部政治合法性的認可，例如：泰國憲法條文賦予泰王具有認可軍事政變合法性的權力，及任命內閣總理與其他文官政府官員權力。往後大多數的政治接替都受到軍事菁英的左右，政變者也會尋求泰王的認可建立統治上的正當性。檢視「王室、軍事菁英、文人菁英」三邊的互動關係是了解泰國「官僚政體」最好的途徑 (陳佩修，2009)。

從泰國的歷史脈絡來看，透過民族主義元素創造新的論述是政治菁英 (Elite) 凝聚國內向心力推展自我認同的著力點。民族主義是國家菁英塑造外交政策極為重要的元素，外交政策制定中的獨立變數，它與國內外其他變數有相互關係或因果關係 (Mylonas & Kuo, 2017)。然而，建構主義強調認同概念之影響，進而影響國家的外交政策與國家行為。換言之，國內

所形成的社會認同 (social identity)，共同的價值、信仰、文化及政治取向，塑造集體觀念 (Tajfel, 1979: 185)。此一集體觀念為意識形態及共享信念體系 (ideologies or shared belief system) 提供養分，建構出個人與團體相互擁護的信條 (Tannenwald, 2005: 15-16)。

本論文欲檢視：(1) 二戰時期泰國國內民族主義是催化外交政策目標的手段，披汶總理 (Plaek Phibunsongkhram) 建構「喪失國土」的論述，與日本政府結盟，宣揚「泛泰主義」 (Pan-Thaism)，達成收復失土的抱負；(2) 「喪失國土」的論述在泰国外交史上的連續性 (continuity) 與斷裂性 (discontinuity)。本論文的主旨是運用建構主義來詮釋第二次世界大戰泰國外交政策的演變，認為國家互為主體的行為者在認知其在國際政治結構中的國家利益，有助於形塑國際政治結構中的國際地位。國際體系的產生乃是基於國家行為體對社會的認同後，投射在國際環境中的國家利益的競爭狀態。

## 貳、泰國民族主義的兩條神經：泰國王室與軍事菁英

民族 (nation) 泛指人種或種族團體，通常不帶有政治意涵 (Heywood, 2012)。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認為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y)，由一群特定團體的人想像所建構而成 (Anderson, 2016)。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所涵蓋的面向就更加廣泛，它可以指一個文化理解或是辭令上的論述 (discourse)，激發對過去歷史事件的認同；也可指涉人們謀求群體利益的社會運動 (social movement)；還可以指政治 / 文化意識形態優於其他民族的主觀上評斷 (Calhoun, 1997)。基於上述要件，本論文以「王室—民族主義」與「喪失國土」做為了解泰國王室與軍事菁英所支持的論述。

學者史崔特認為「王室—民族主義」與「喪失國土」相互競奪，前者歌功頌德王室如何透過彈性外交的手段與列強交涉，使泰國維持主權獨立免於列強殖民之災；後者則強調泰國的主權在歐洲列強環伺下，已逐漸喪失主權，寄望軍事菁英能夠帶領泰國重拾國際聲望，收復失土。兩種相互

駁斥的論點在不同的歷史事件中也引領出不同的詮釋，如：1855 年簽訂的『寶寧條約』(Bowring Treaty)，「王室—民族主義」認為拉瑪四世(即蒙固王)非常有遠見，將曼谷融入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網；支持「喪失國土」論者認為蒙固王允許歐洲人擁有治外法權，還放棄訂定關稅的權利，完全是經濟主權的侵略(Strate, 2019)。

1893 年法暹戰爭(Franco-Siamese War)爆發，三艘法國戰船在北欖與暹羅守軍發生衝突，最後法軍封鎖曼谷，暹羅戰敗。值得玩味的是起初暹羅一直寄望英國會介入協助暹羅，因為英國仰賴暹羅在東南亞的貿易所形成的網路，但英國真正介入是在曼谷被包圍後才出面介入。法暹戰爭的意義除了拉瑪五世(即朱拉隆功)同意割讓寮國予法國外，也確立了暹羅在英屬印度和法屬印度支那兩地間中立的地位(曾朗天, 2016)。

雖然法暹戰爭決定暹羅的國際地位，但是法國允許法屬印度支那的居民可以申請法國保護的身分，對暹羅造成治外法權上的挑戰。1907 年暹羅同意法國對馬德望(Battambang)、暹粒(Siem Reap)、及詩梳風(Sisophon)的控制，換取「法國亞洲屬民」豁免權的廢止。在 1909 年，暹羅將吉蘭丹(Kelantan)、吉打(Kedah)、玻璃市(Perlis)與登嘉樓(Trengganu)屬馬來州的政治控制權交給英國。英國同意將領事裁判權交還給暹羅政府，暹羅需現代化法典並公開大眾(Strate, 2019)。「王室—民族主義」認為朱拉隆功運用彈性的外交技巧與列強談判，使得外國保護令無法挑戰暹羅法律體系的權威。「喪失國土」論者認為即使 1907 年與 1909 年的合約終止治外法權的議題，暹羅在諸多方面依然無自主權。

史崔特的「王室—民族主義」與「喪失國土」為泰國民族主義提供非常好的素材，不論是「王室—民族主義」或「喪失國土」都反映出特定歷史時期的脈絡與因果關係。暹羅直到 1925 年後，才開始與英、法兩國進行不平等合約的修訂。1920 年，暹羅並沒有太明顯的中產階級(中國商人除外)，多數的農民也是文盲，對政府的外交政策並沒有很深入的認識(Hell, 2010)。史崔特補充「喪失國土」或『寶寧條約』過程複雜，當時的政府不認為需要跟社會大眾交代來龍去脈(Strate, 2019)。因此，「王室—民族主義」在 1850-1930 仍占主導地位。

多數政治學者皆認為民族主義是雙面刃，人們可透過歷史、文化、社會或社群情感，找到歸屬感與認同感，為社會帶來和平或正向的社會發展。另外一方面，民族主義非常有可能轉變成軍事主義、民族統一主義，這正是披汶總理所建構的「喪失國土」論述，設想讓人民認同泰國在與列強交涉中，一直處於被欺凌的弱勢國家。然而，筆者認為「王室—民族主義」或「喪失國土」都同時存在於泰國的政治生態中，更重要的是誰主導或重新詮釋泰國民族主義是關鍵因素，是透過甚麼方式來傳遞新的意識形態觀念，塑造國內的認同界定國家利益，進而與其他國家建構集體的國家利益？

1932年，披汶發動政變，並頒布王國憲法，暹羅成為君主立憲政體。拉瑪七世為維持國家穩定，透過與政變者談判的方式代替流血衝突。此後暹羅由軍事菁英與文人菁英相互組成臨時政府，國王為武裝部隊最高統帥並有權解散國會 (Keyes, 1989)。國內泰國研究學者陳佩修 (陳佩修, 2009) 注意到成功的政變者都會請求泰王的原諒，泰王的認可也就意味人民的默許，做為政變結果「正當性」的依據。此次政變除了勾勒出「王室、軍事菁英、文人菁英」三邊的權力分佈關係，更突顯在位者政權此後，與王室的關係。

1938年，披汶擔任泰國總理，隔年將國名暹羅改成泰國，此後泰國進入長期的軍事統治。披汶任內強調國家軍事武力的重要性，其透過報紙、演說及媒體創造集體傷痛 (trauma) 回憶 (Volkan, 1997)，重拾國家榮耀，做為「菁英論述」的基礎。事實上，「喪失國土」論述是要將 1938 年第一次法暹戰爭 (Franco-Thai War) 分離出去的民族結合在一起；因此，法屬印度支那的寮人與高棉人皆屬大泰民族的一部分。1940年，第二次泰法戰爭，披汶總理在國內渲染「失土論」 (lost provinces) 要求維琪 (Vicky) 政府能夠交還朱拉隆功大地所喪失之領土，成為報章雜誌聲援的焦點 (Strate, 2019)。

1940年7月，在戰爭前披汶曾告訴日本駐曼谷代辦 (Chargé d'affaires) Asada Shunsuke 其親日的立場，近期將派親善使團赴日爭取日方支持。披汶嫡系大將 Sinthusorjkhraamchaj 私下告訴 Asada 泰方此次寄望日方能夠向法屬印度支那施壓，泰國能夠趁這次機會進行「收復失土計畫」 (irredenta

plan)。8 月，泰國使節抵達東京，就『日泰友好條約』(*Japan-Thai Treaty of Friendship*) 的基礎上，開展未來雙方合作之契機。此時，歐洲戰場猛烈，英美兩國對泰國的計畫並不熱衷，只有日本樂見披汶採取行動 (Flood, 1969: 312-17)。雖然日本並未承諾提供具體的協助，卻開啓未來雙方合作的新契機。

日本在中南半島的野心是明顯的，伺機擴張其在中南半島的影響力。9 月日本入侵法屬支那，並在當地同時也在法屬支那部屬軍隊。11 月泰國對法屬印度支那邊界展開襲擊，開啓第二次泰法戰爭；最後，日本敦促雙方進行停火協議，允許泰國收復柬埔寨馬德望省大部份和寮國境內湄公河以西的領土。日本出面調停除了增強其在區域的影響力，也希望能夠獲得藉由泰國通往英屬緬甸及馬來亞的通道，這正是日本在泰國的核心利益所在 (Styrsky, 2011)。對於日本而言，泰國戰略角色的意義遠超出其收回失土的民族主義論述。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軍在泰國南部多處備軍，登陸時遭受到泰國警察軍隊抵抗，在短短幾個小時內披汶總理放棄抵抗，同意日軍借道泰國入侵英屬緬甸及馬來亞。隨後日軍揮軍入侵英屬馬來亞，偷襲美國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日本持續對泰國施壓，泰國為維護軍隊、政權及國土完整簽訂『日泰同盟條約』(Christian & Ike, 1942: 195-97)。部分學者認為，泰國長期處於英、法的殖民枷鎖中，民族主義早已開始萌芽，日本勢力的進駐能夠平衡英國的勢力。因此，披汶的民族主義是催化泰國與日本結盟的關鍵因素之一 (Christian & Ike, 1942: 197-99)。

### 參、新現實主義的反思：披汶「泛泰主義」與日本「泛亞主義」的新秩序

泰國於 1942 年 1 月對同盟國宣戰，對外關係上順勢應變，靈活地遊走於大國博弈國際體系間，而不損國家利益；此種審時度勢的外交政策 (status-driven foreign policy)，外交史學者稱「竹子外交」或「風中之竹」(bending with the wind)，且完全符合新現實主義的內涵 (Poonkham, 2019)。披汶與日本建立同盟關係與其說是被脅迫，不如說當下與日本同盟的利益

大於弊。披汶除了能保有自己的軍隊，國家更可以維持獨立。列強在中南半島的競逐，權力必有消長，與日本的夥伴關係也能增強泰國的權力。

根據新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社會雖然為無政府狀態，國際體系為理性主權國家追求國家利益下的權力排序，可分為單極、兩極與多極體系。國家的行為會受到國家體系的制約，而有不同的行為模式。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華爾滋（Kenneth Waltz）認為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社會，國家行為體會因為安全而累積權力，安全極大化是目標，權力只是追求的手段。因此，國際體系中權力的分配非絕對的概念，會因為國家權力的消長而有所不同，權力平衡會因為國際體系而形成（Waltz, 1979）。

筆者認為華爾滋透過演繹推理（deductive reasoning）來建立國際體系的通則，雖然有助於我們了解國際體系如何變化的表徵，鮮少觸及對體系內部國家互動關係。沃特（Steven Walt）提出「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並補充：若國家遇見安全上的威脅時，會組成聯盟體系，形成權力平衡。若小國在做出聯盟時會以地緣政治做考量、認知意圖（perceived intension）與進攻能力（offensive capability）做為結盟之依據（Walt, 1987）。沃特同時也提出扈從（bandwagon）的觀念，扈從大國不但可以從大國獲得好處，也可以避免衝突的發生。

歸納上述新現實主義的論述，理論的核心係以「權力」為分析途徑，卻無法彰顯國內因素結構對外交因素的影響力。這種研究方法無法有效理解泰國國內政治社群與「官僚政體」在外交政策上的關聯性，亦無助於我們了解泰國國內政治社群與體系國家行為者之關聯性。

著名泰國學者 Peera Charoenvattananukul（2019）指出，泰國一直在體系中定位自己，國際體系是泰國建構的結果。關於泰國如何定位自己在體系中的地位跟下列兩點論述有關：

1. 泰國的文明定位（Thailand's search of civilization）：從 19 世紀與歐洲列強接觸後，泰國的定位與認同，如：在與英國簽訂的『寶寧條約』，在本土法系中引進治外法權，暹羅的領導人積極爭取西方國家的認同；傳統泰國文明在歐洲人眼裡是落後又低俗的。
2. 披汶的民族主義與國際地位焦慮感（Phibun's nationalism and status

anxiety)：披汶任內推動民族主義，建立「泛泰主義」，頌揚國家認同，激發愛國心，如 1932 年 6 月 24 日訂為國慶日。

此外，1941 年第二次泰法戰爭，強調寮國與柬埔寨為泰國之失土，敦促維琪政府歸還失土。由於日本從中斡旋，泰國得以收回失土外，亦從日本手上接管兩個緬甸邦與四個英屬馬來邦。

筆者認為 Peera Charoenvattananukul 的文獻非常具有參考價值，以泰國為主體，強調民族主義為西方列強認同不可或缺之因素，勾勒出與其他國家互動關係，並產生定位。因此，這樣的論述更加貼近建構主義，強調國際政治的體系結構是不同國家行為者所建構出的結果，其核心概念是「規範」(norm)、「認同」(identity)、「文化」(culture) (Wendt, 1999)。因此，泰國靈活地在強權中運用平衡外交反映出該國內部認同的投射，多次的見風轉舵更是對安全利益的認同。

若是要在國際政治結構中創造一種「規範」，就必須要仿效日本，建立「泛泰主義」，實踐「大泰帝國」的願景。「泛泰主義」就是要將泰族人集結起來建立一個民族國家，包括：緬甸的撣族、中國的傣族、越南的孟族與老撾人 (金勇, 1999)。1940 年，披汶總理頒布『民族文化維持令』(*National Cultural Maintenance Act*)，旨在促進泰族秩序、團結、繁榮並提升人民道德。此外，『泰人習慣規範令』(*Prescribing Customs for the Thai People*)，規範泰族的服裝儀容 (陳鴻瑜, 2014)。一民族一國家的想法可訴諸人種上的情感，超越主權國家藩籬，號召 1938 年第一次法暹戰爭分離出去的法屬印度支那的寮人與高棉人回歸泰族。

披汶以泰族為中心的政策也推展至泰南伊斯蘭教徒區，鼓勵穿著泰服、說泰語並使用泰國姓氏。由於披汶關閉伊斯蘭教學校與伊斯蘭教法庭，遭受當地領袖反抗，並求助於英國當局 (陳鴻瑜, 2014)。因此，披汶的「泛泰主義」試圖同化泰南的馬來族，這種民族統一主義的號召刺激分離主義的發展。

綜觀泰國的歷史，英國與泰國接觸的歷史遠比日本還要長，並與泰國王室都保持良好的關係，當時有些泰國官員甚至反對披汶政府與日本結



盟，泰國駐美國大使西尼·巴莫（Seni Pramoj）甚至在華府建立「自由泰運動」（Free Thai Movement）主張泰國與其他同盟國締約，將日軍驅逐出泰國（陳鴻瑜，2014）。究竟披汶是透過甚麼方式，傳遞其思想體系，合理化與日本結盟關係，成為國家利益？

披汶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控制所有大眾媒體，透過報章雜誌發表親日言論、反殖民事動與「喪失國土」論述。泰國 *Nikorn* 於 1941 年 5 月 24 日曾報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斷絕日本向外拓展市場取得原物料的機會，避免其工業化。即便如此，日本還是能夠製造出物美價廉的成品，推廣至亞洲與歐洲產品競爭市場」；*Santi Rasadorn* 也以「太平洋戰爭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為主題報導：「英美兩國壓縮日本的空間，擔心若是日本有一天壯大，將會危及既有的帝國主義秩序」（*Strate, 2019: 175*）。上述言論，對日本與泰國遭受到歐洲列強欺凌的歷史記憶產生共鳴，更容易在意識形態上有所連結。

事實上，「泛泰主義」與日本「泛亞主義」的鏈結主要是在思想上摧毀過去由美英主導的舊秩序規範。1941 年所簽訂的『東京和平協定』，鼓吹亞洲團結，泰日為盟（*Reynolds, 1994*）。時任不管部部長的威集，曾經表示泰國可以擁抱大東亞共榮圈的願景，因為泰國可以從中獲利更多，例如：第二次泰法戰爭就是向維琪政府收回失土，已新的東亞秩序體系中跨出第一步（*Strate, 2019*）。

筆者認為「泛泰主義」是依附在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次級秩序，在短期內或許可以為泰國重新定位國際地位。唯泰族與大和民族歷史淵源不深，宗教信仰流派不同，透過意識形態建立的體系至多只能滿足官僚政體上位者的私利。事實上「泛泰主義」界定過於廣泛，要打造一個屬於泰族的大泰國何等容易？至多我們可以說這是披汶求生存的保衛戰。

#### 肆、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泰國：與盟國互動關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披汶總理於二次大戰期間在表面上持續與日本進行「泛亞主義」戰略結盟，同時並未禁止自由泰在泰國所進行的政治活

動。1944 年，日軍二戰局勢失利，泰國國會強迫披汶辭職，政權由自由泰國運動所把持，指派文人寬·阿派旺（Khuang Aphaiwong）出任總理。同時也透過自由泰政府向美、英表達適當的合作契機。1945 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比里·帕農榮（Pridi Phanomyong）做為攝政公布了和平宣言，宣稱「泰國 1942 年對美英宣戰宣言無效」，否定了鑾披汶·頌堪政府和日本的所有協議，美國也承認泰國的「宣戰無效」（羅依柔，2016）。泰國在生存安全的利益上，實施了兩手外交政策，審時度勢的外交政策使泰國避免戰後的厄運。

由西尼所領導的自由泰政府除了將英文國名改回 Siam 外，呼應政府主張，過去協定簽署責任應歸咎於披汶政權，而非泰國本身。然而，美方認為西尼與比里為泰國戰時合法領導人，泰國向盟國宣戰的責任應由披汶承擔，不把泰國當作交戰國看待。英國則不這麼認為，披汶讓日本借道攻擊緬甸與馬來亞造成損失慘重，泰國需賠償英國。在美國的斡旋下，英國放棄了很多對泰國的索償（Strate, 2019）。

筆者認為，隨者日本的戰敗，「喪失國土」的論述的衰落，文人領導的政府又恢復「王室—民族主義」，強調建立一個和平、親西方的形象。根據建構主義的論述，自從 1945 年日本戰敗後，美國與其他同盟國逐漸恢復過去所建構的國際文化與規範，同時泰國的國際地位也依其對外的安全認識而有所改變，也就是從二戰債權國的角色轉變成非主要債務國。泰國是軸心國中，受懲罰最輕者的國家，主要是因為其部分文職官員在美國組織自由泰運動對於美泰軍事情報的蒐集上有很大的助益。

面對法國提出的索求，比里建議提交於英—美仲裁委員會處置，但遭法國拒絕。第二次泰法戰爭從法國手上所奪回的失土，成為泰法之間待處理的外交議題之一。1945 年 11 月，西尼建議將此爭議提交聯合國處理，英、美的立場是希望能夠回復 1940 年前的狀態。泰國深知若要持續保有所有的四府十分渺茫，種種跡象都顯示法國不願意與泰國直接進行對談（Strate, 2019）。事實上，披汶所提倡的「喪失國土」的論述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是遭受到挑戰的，第二次法暹戰爭所取回的失土也只是曇花一現，「泛泰主義」最終都無法使泰國重拾國家榮耀。然而，對於「喪失國土」的支持者而言，

這無疑是一次被軍事菁英所操作的民族主義議題罷了。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自由泰的勢力有所增長，但是披汶的軍事權威並未因此消退。1948年，寬·阿派旺與軍政府鬧翻，披汶重新掌權，實施軍事獨裁統治，而寬·阿派旺則擔任反對黨領導人。1957年，國防部長沙立·他那叻（Sarit Thanarat）發動政變，保守派軍事菁英質疑披汶親美的立場，同時與中國開始貿易，表達不滿。此外，披汶也被指控選舉舞弊，披汶政權逐漸喪失支持，流亡海外（顧長永，2013）。

## 伍、結論

本論文主要探討泰國二次世界大戰外交政策中，民族主義因素的影響與作用，有必要釐清泰國民族主義興起的背景與意涵，透過建構主義作為研究途徑，發現民族主義是實踐泰國外交政策目標的手段。泰國在維護國土獨立的外交政策目標上，採取了兩種不同民族主義：一、「王室—民族主義」：著重於國際主義的世界觀，對於西方經濟、制度以及文化的認同度較高；二、「喪失國土」：著重於重建泰族的國家榮耀，必須將1938年第一次法暹戰爭分離出去的民族結合在一起，收復失土。這兩種不同的民族主義互斥性極高，導致泰國外交政策缺乏連貫性。

軍事政變是泰國政治的常態，也勾勒出「王室、軍事菁英、文人菁英」三邊的互動關係。軍事菁英及文人菁英時常在政變時，建構與時俱進的民族主義型態。在檢視泰國二次世界大戰的外交政策時，比里與西尼傾向擁護君主專政；披汶當任總理時，傾向透過歷史傷痛記憶（第一次法暹戰爭所喪失之領土）強化群體的國家忠誠與團結。披汶建築「泛泰主義」、打造新的史觀、推行文化霸權，這完全已經超出維護國土獨立的目標。

二次大戰後，披汶不僅沒有重拾國家榮耀，無法打造一個涵蓋東南亞所有泰族的大泰國，更無法收復失土。正如學者 Peera Charoenvattananukul 所言，泰國一直在體系中定位屬於自己的泰式文明，正是處於相較弱勢國際地位的焦慮感，催化軍事菁英「喪失國土」的論述。

## 參考文獻

- 金勇，2013。〈泰國變披汶時期的文化政策及其意涵〉《東方論壇》6 月 23 日 (<https://fh.pku.edu.cn/docs/2018-11/20181119195422187320.pdf>) (2021/11/11)。
- 曾朗天，2016。〈在那列強蹂躪亞洲的 19 世紀，為什麼泰國從未被殖民？〉《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11 月 23 日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4667>) (2021/11/11)。
- 羅依柔，2016。〈二戰哪個亞洲國家最聰明？把日本整慘了〉《中時新聞網》5 月 10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hottopic/20160510002148-260812?chdtv>) (2021/11/11)。
- 陳佩修 (編)，2009。《軍人與政治：泰國的軍事政變與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陳鴻瑜 (編)，2014。《泰國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顧長永 (編)，2013。《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Anderson, Benedict. 2016.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Press.
- Calhoun, Craig. 1997. *Nation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haroenvattananukul, Peera. 2019. *Beyond Bamboo Diplomacy: The Factor of Status Anxiety and Thai Foreign Policy Behaviours*. London: Routledge.
- Christian, John, and Nobutake Ike. 1942. "Thailand in Japan's Foreign Relations." *Pacific Affairs*, Vol. 15, No. 2, pp. 195-200.
- Mylonas, Harris, and Kendrick Kuo. 2017.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https://oxfordre.com/view/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37.001.0001/acrefore-9780190228637-e-452>) (2021/11/09)
- Flood, Thadeus. 1969. "The 1940 Franco-Thai Border Dispute and Phibuun Sonkhraam's Commitment to Jap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Vol. 10, No. 2, pp. 311-20.
- Hell, Stefan. 2010. *Siam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Modernization, Sovereignty, and Multilateral Diplomacy, 1920-1940*. Bangkok: River Books.
- Heywood, Andrew. 2012. *Political Ideologies: An Introduction*.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 Keyes, Charles. 1989. *Buddhist Kingdom as Modern Nation-State*. Bangkok: D. K. Book House.

- Poonkham, Jittipat. 2019. "Why Is There No Thai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Great Debates Revisited, Critical Theory and Dissensus of IR in Thailand," in Chantira na Thalang, Soravis Jayanama, and Jittipat Poonkham,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Discipline in Thailand: Theory and Subfields*, pp. 19-4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eynolds, E. Bruce. 1994. *Thailand and Japan's Southern Advance, 1940-194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Strate, Shane (譚天譯), 2019。《從暹羅到泰國：失落的土地與被操弄的歷史》(*The Lost Territories: Thailand's History of National Humanitarian*)。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Styrsky, Stefen. 2011. "Franco-Thai War, 1941." (<http://armchairgeneral.com/franco-thai-war-1941.htm>) (2021/11/12)
- Tajfel, Henri. 1979.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n social psych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Vol. 18, No. 2, pp. 183-90.
- Tannenwald, Nina. 2005. "Ideas and explanation: Advancing the theoretical agenda."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7, No. 2, pp. 13-42.
- Van Dijk, K. 2015. *The Pacific Strife: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i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valries in Asia and the Western Pacific 1870-1914*.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Volkan, Vamik. 1997. *Bloodlines: From Ethnic Pride to Ethnic Terroris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Walt, Steven.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Little Brown.
-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e Duality of Nationalism: Thailand's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Yu-Cheng Teng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Teaching Excellent Center,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nlin, TAIWAN*

## Abstract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surrounded by the British and French powers, Thailand would take geopolitical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nto consideration to enhance its relative power while competing with powers in the Southeast Asia structure. Realist and geopolitical scholars argued that Thailand's engagement or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powers is driven by security concerns, trying to maximize its own interests. Throughout Thailand historiography, this paper has summarized two different discourses: The Royal nationalism and the loss narrative. The 3<sup>rd</sup> Prime Minister Plaek Phibunsongkhram constructed the loss narrative in which Thailand could regain its lost territories by forging an alliance with Japan and presented this to the public through media. The main theme of this paper is to interpret the evolution of Thailand's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rguing that the national interests perceived by interactive actors were conducive to nation's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ucture. The emergence of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based on the recognition of society by national actors. "Pan-Thaiism" was ideologically flourished by the Thai military elite, and Constructivism provides a new appraisal of interpreting Thailand's foreign policy.

**Keywords:** nationalism, Royal nationalism, loss narrative, Constructivism, Phibunsongkhram